

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

李敬泽

孟子有理想，但有时他会遇见比他更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。

比如那日，酒席散了，他的弟子彭更借酒撒疯提意见：像您老人家这样，几十辆车开着，数百弟子跟着，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，这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

孟子的表情我们看不见，但我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平静如水，他答曰：“非其道，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；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——子以为泰乎？”

只要有真理，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，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，舜也没客气，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？

——孟老先生啊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，你马上抬出个舜来，舜王爷是大圣人，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，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？

所以，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，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：“土无事而食，不可也！”

这是惊雷，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：你们这帮家伙，不劳动白吃饭，不行！

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，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，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，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，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，守精神家园，也算是一份工作，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。

彭更愣了一会儿，忽然，他更生气了：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？

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《孟子》。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，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：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，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，但紧接着他又宣布，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，那也是可耻的。精神活动不仅是“事”，而且是无比纯洁的“事”，不应掺杂任何世俗考量。写小说就是写小说，不能想着挣版税。

两千年前的那一天，孟子面对这个弟子，他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，这位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，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，居高临下，胜券在握，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。

——一方面，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，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；另一方面，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，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：你为什么不为纯粹为什么为稻粱谋？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？

两大高地绵延不断，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生。曾几何时，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，而今天，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，“理想主义者”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，然后，他们宣布：所谓“精神”不过是苟且的权谋，果然如此，总是如此。

面对后一种责难，孟子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，他实际上说：请你读我的书，你不应当追究我的动机，就好比你看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。这当然不行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，两千年前的那天，如果换了我，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：

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，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，他的思想、想

象和精神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，即使是佛，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，而人，他是带着满身的伤，带着他的罪在思想着。思想者丑陋，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。

——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，这个叫彭更的人，他是比孟子更强大的人，他是带着满身的伤，带着他的罪在思想着。思想者丑陋，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。

西南联大之所以被称为“奇迹”，不仅因为师生之中涌现出了为数众多人才，也因为与北大、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，在八九年时间中，各自保有一定的独立，却又融合得亲如一家。

三校合作无间，首先当然仰赖三校长、后来的联大“三常委”——梅贻琦、蒋梦麟、张伯苓。近年来被提及最多的是梅贻琦，而出身北洋水师倾力办学的张伯苓，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，比如何兆武先生的《上学记》中回忆道，张伯苓曾和学生说：“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有一个表，我就给他戴着，我跟他说：‘你是我的代表。’”让人觉得幽默可亲近。

在联大政治系毕业生张廷幹的记忆里，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、大学的张伯苓常用他的天津口音念叨的一句话是：“恩来是我的学生，月涵（梅贻琦的字）也是我的学生。”很显然，培养出优秀學生是最令张伯苓骄傲自豪的。而毕业于南开的梅贻琦每次听到老校长讲这句话，自然是在边上恭恭敬敬俯首帖耳，场面很是有趣。

张廷幹对梅校长也很敬仰。“按照当时的规定，清华校长就算不坐汽车，至少可以坐个包车来上班，但是梅贻琦先生每天就是夹着一本书，自己走到学校来。”张廷幹特别强调：“这我是亲眼看到的。”

回忆联大岁月，1919年出生的张廷幹一直重复一句话：“当时艰苦是艰苦，但人家没什么怨言。”为了补贴家用，梅夫人和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的夫人，还在家做糕点，放到店里寄卖。有时候怕被人认出来，还要特意包一个头巾出门。张廷幹还听说过一件事：“有一次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和梅夫人说，大家都说您来做得很好，很想来试试您的厨艺。梅夫人当然只能答应，虽然人家说是吃便饭，总不可能很随便地招待一下，最后只能把家里东西当了，请龙云夫人吃了一顿饭。”

张廷幹住过40人的大通铺，屋顶上面铺的是茅草。他还亲眼看见，

“伟大”，我从来都没有对一个词语，冠以这么高的称号，我的文章里，也几乎不用“伟大”，但，这一回，我想将这个光荣称号，授予“倦出”这个词。

倦出，意思简单，就是急于外出，就是懒得出门。这不是个现代词，它

有比较悠久的历史。北宋词人史达祖有词曰：倦出犀帷，频梦见，王孙驀马。

这是宋词惯用的悲情离别，王公贵族泡妞后离去，多情女却无法忘怀，闺门一步也不迈出，终日懒洋洋躺在香床上，做着已逝的美梦。

不要以为，倦出，只是形容美女的，大男人也可以倦出。元代剧作家史九敬《庄周梦》，第二折中有这样的场景：这汉子好无礼，见俺女人，又不回避，俺老爹在家倦出，好，揪进去打这厮！

场景极生动。一个痴汉，见了美貌的女子，眼睛不拐弯，这多吓人呀，人家老公自然不愿意了，且，这男汉仗着家里还可以打群架的帮手，气势汹汹。他

晚餐后，若不是刮风下雨天气恶劣，我一定会出门散步。有时候有家人作伴，有时候就一个人。

出了大门向左转，穿过一个地下隧道，就是狭长的东海岸公园。公园里林木幽深，走道宽阔，虽然能听到高速公路的车马喧嚣声，但仍不失为一个健走的好地方。

偶尔我也会向右转，到静谧安详的私人住宅区走走。

有着明亮灯光和烟火气息的人家，总让人感到十分温暖。一瞥之间，似乎能略略知晓他们的生活。院子里若有秋千架，那么那户人家必有或曾有一个或几个小顽童，我会想，那小顽童长大了吗？偶尔可会坐在这秋千上，回味一下那童年的快乐？

而满园花草散发浓郁馨香的人家，必有令人艳羡的绿手指，以及栉风沐雨的辛劳，才得以日日享受这醉人芬芳，也无意中让我这路人分享。若是隐隐约约听到铃声，凭着琴音，我会猜测那琴童已经学到了钢琴八级或大提琴五级……

比较神秘的，是那些没有灯光的人家。若是窗扉紧闭，应该是暂时出国或在

他处居住；若是窗户洞开，则表明屋子长期无人居住，开窗只为通风。在星月黯淡，就连路灯也昏黄的夜晚，望一望那黑漆漆的窗口，颇有些心惊。这是地价位都很昂贵的地区啊，这么大的宅院，这么久的时间，只有风居住着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
我的好奇心简直要爆棚，就差没登报询问，这些神秘的宅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些曾经在里面欢笑和哭泣的人，如今星散何方？

这么巧，有一晚我正从一栋大宅前走过，遇到一个也住在附近的朋友，她居然知晓这栋大宅的故事。她告诉我，这栋大宅属于一对老夫妇，他们年轻时勉力打拼，盖了这栋房子，为五个子女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教育。可惜的是，他们过世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，过世后，五个成年子女对这栋大宅的处理意见不一致，吵翻了天，还有人向法院申请了庭令。于是这栋大宅，既不能卖，也不能拆，更没人住，一年又一年。

兄弟阋墙，姐妹反目、楼阁空置、庭院荒芜，那对老夫妇若泉下有知，会不会双泪长流？

空宅之谜

(新加坡)王文献

对对子

任溶溶

我喜欢看对联，因为很有味道，对得工整，会令人拍案叫绝。我想起几十年前，上海的报上登出一个上联征求读者作答，答得好者有奖。这上联是“五月黄梅天”。过了好多日子，中奖的下联出来了，是“三星白兰地”。原来这是三星白兰地酒厂摆的噱头。但“五月黄梅天”对“三星白兰地”确是妙对，“五月”对“三星”，“黄”对“白”，“天”对“地”，对得再工整

不过，不由人对摆噱头的名士佩服不已。觉得好玩，我也凑了一副对子，曰：“晚报日日有，日光晚晚无”，供一笑。

时代，我不知道，未来，“倦出”还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发展。

严格说来，“倦出”是一个词组，形容词和动词结合，偏正或动宾，倦，厌倦，疲倦；出，出门，外出。但它们却是一个伟大的神仙组合，搭配是那么的默契，韵味无穷，意象万千。

旧瓶装新酒，旧词表新意。顽石变美玉，腐朽为神奇。

中国文字，真是博大精深，常琢常新。

傻想，要是有一天，大家都会“倦出”，倦在家里读书、做事，那又是怎样一种风景呢？

坐着家里就把钱赚了，马路畅通，车子不堵。哈哈，你这不想将骆驼拖过针眼吗，痴心梦想，那只能是在深夜里，睡梦中。

角色系列（中国画）周京新

不久前，我受一位患病老教授委托，去《炎黄子孙》杂志社代领样刊，顺便收取本人一点稿酬。敲开办公室门，除了工作人员外，还坐着一位面容敦厚、满头染霜的长者，工作人员向我介绍说他是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杨益萍。杨会长听说我是该会会员，便热情地伸出手来，又替刊物垫付了稿费。我离开时，他又热情地同我握手。这个礼贤下士，委实使我有了一点感想，不由想起一些往事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天上午，一位衣着朴素、瘦瘦的中年人突然来到我的工作单位，他自我介绍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任大星，是我的一篇即将刊发在《上海少年》的短小说的责编。那时，交通不太便捷，我所在的仓库又没有门牌号码，他换乘了二三辆公交车，七转八弯才找到我。任先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造访我这个初学写作者，我确实有些受宠若惊。记得他坐在木匠工具箱上，抽着自备的大前门香烟，对我说了不少勉励话。正因为他

的勉励，使我与儿童文学结下不解之缘。

文艺的春天来临后，一天我顺路去看望关心过我的《儿童时代》资深编辑苏玉孚。苏先生正巧不在，一位年轻的身材颇长的女编辑正在接待两位造访者，见我向她询问，便站起身，应诺转告苏先生。她站立着，直至我离去。后来在中福会大礼堂召开一个会，我看见她坐在中排的座位上，听人说她叫王安忆，是女作家茹志鹃的女儿。如今王安忆是遐邇闻名的女作家，当年她彬彬有礼恭送素不相识的业余作者的身影，仍然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。

投稿多了，会收到不少铅印的退稿单，也会收到编辑的亲笔退稿信。有段时间我热衷于学写诗歌，寄了几首给《萌芽》，不久收到退稿和一封署名赵丽宏的编辑的信，尽管稿件不能录用，他委婉地提了一些意见。满纸的蝇头小楷，工工整整书写在竖条的浅黄色棉纸信笺上，给人亲切和愉悦的感觉。数十年来，我从学校的集体宿舍搬到分配的斗室，又搬迁到如今的蜗居，一些编辑的亲笔信，无论是退稿的还是录用的，我大都保存着，包括著名诗人兼散文家赵丽宏的那封别具一格的退稿信。

父亲是

她最好的榜样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西南联大的上海人

责编：徐婉青

夜光杯